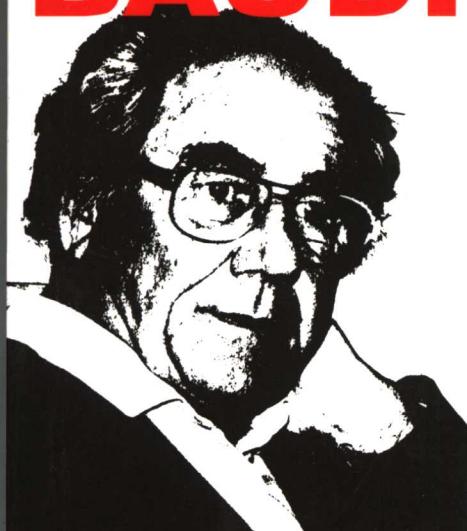


BAUDRILLARD



戴阿宝 著

终结的力量

——鲍德里亚前期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BAUDRILLARD



戴阿宝 著

终结的力量

——鲍德里亚前期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终结的力量：鲍德里亚前期思想研究/戴阿宝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

ISBN 7-5004-5492-9

I. 终… II. 戴… III. 鲍德里亚-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B565.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0434 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特约编辑 宋凌云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任菊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2

字 数 237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上篇 符号逻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终结

一 物与消费	(23)
1. 物的非功能性	(24)
2. 神话与符号	(39)
3. 消费意识形态	(52)
二 符号学与政治经济学	(62)
1. 使用价值的幻象	(63)
2. 符号学批判	(76)
3. 象征性交换的当下性	(89)
4. 符号政治经济学之可能	(100)
三 历史唯物主义的终结	(118)
1. 生产的镜像	(119)
2. 历史与自然的去蔽	(128)
3. 历史唯物主义式微之意义	(141)

下篇 超真实与后现代境遇

四 超真实理念	(149)
1. 类像与价值	(151)
2. 超真实与模型先在	(160)
3. 超真实的虚无	(178)
五 时尚逻辑	(184)
1. 时尚的再循环逻辑	(186)
2. 时尚中的身体与性	(191)
3. 时尚工业与日常生活	(206)
六 媒介策略	(215)
1. 媒介内爆	(216)
2. “冷”媒介的文化操控.....	(224)
3. 媒介时代的大众抵抗	(232)
七 美国客体	(242)
1. 沙漠中的美国	(243)
2. 实现了的乌托邦	(251)
3. 形而上学之旅与宿命	(261)
八 艺术狂欢	(271)
1. 传播帝国主义	(272)
2. 空间的欲望：蓬皮杜中心	(275)
3. 小说虚构的延伸	(282)
九 后现代与鲍德里亚	(289)
1. 后现代的两种模式	(290)
2. 鲍德里亚的双重面孔	(307)
余论 鲍德里亚的恐惧	(321)

目 录 3

附录	(327)
参考文献	(337)
后记	(345)

导 论

在《象征性交换与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1976）一书的开头部分，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激情洋溢地宣布：

劳动终结了。生产终结了。政治经济学终结了。促进知识和意义积累的、叠加话语线性语段的能指/所指的辩证法终结了。同时，使积累和社会生产成为可能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辩证法终结了。话语的线性维度终结了。商品的线性维度终结了。符号的古典时代终结了。生产时代终结了。^①

从这一系列的“终结”的宣告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鲍德里亚巨大的理论激情和挑战权威的自信。鲍德里亚的这一系列终结是他前期理论活动的一个写照。终结是鲍德里亚一生学术活动的一个或隐或现的主题，这既是一种浪漫情怀的体

^① 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 Iain Hamilton Grant, Sage Publications, 1993, p. 8.

现,也是一种理论批判的张扬。鲍德里亚一方面始终脱离不了那种植根于形而上学情结的超越冲动,一方面却始终在以批判的目光审视着他周围的一切。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强烈的终结意识。如果用一个社会学家的标准来衡量鲍德里亚,他的理论批判充满了哲学家的意味,他绝不满足于在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满足于把视角深入到事物的具体过程,而是试图从极其普通的现象生发出不同寻常的理论思考。鲍德里亚以其独到的视野、深入的批判和富于魅力的表述,使得他提出的诸多重要概念和思想作为原创性理论资源被西方学术界所广泛接受。终结成为一个萦绕在他头顶上的思想光环,散发出持久的魅力。说他是一位具有终结身份特征的思想家,一点也不为过。

1. “五月风暴”的精神征候

当代法国学术界乃至西方学术界,在它们的思想史的求索中,不仅会出现久远的希腊思想的影子,发生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也会赫然名列其中。“五月风暴”,当代法国的一场革命,既是社会革命,也是知识革命。它作为一个反抗情节而积淀下来,成为革命和批判思想的底蕴,魂牵梦绕,挥之不去。“五月风暴”不仅是西方左派的精神家园,也是一切富于理论和现实反抗精神的思想家的家园。

鲍德里亚,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走上学术之途,其足迹涉及众多学术领域,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符号学、精神分析、传媒理论、艺术、后现

代主义等诸多领域里的研究为西方学术界所高度重视。雷恩 (Richard J. Lane) 曾大致这样描述过鲍德里亚前期的生活经历和治学过程：

鲍德里亚于 1929 年 7 月 27 日出生在兰斯 (Reims)。他的成长经历和接受教育的情况非常普通。1956 年，他开始教授作为中等教育的社会学，直到 1966 年，这一年他在巴黎南特第十大学进行了学位论文《物的系统》的答辩。鲍德里亚的早期著作主要是在法语世界中流传，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文章和书评。但在 1968 年后，随着他的学位论文的出版，他的写作开始闻名于跟踪法国理论发展的英语世界的学术界。1975 年，鲍德里亚开始执教国外，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鲍德里亚真正的学术声誉不是来自于他早期的非常学院化的著作，而是来自于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出版的短小而富于高度挑战性的批判性著作，它们以英语出版于纽约符号文本的“外国名人系列”。或许，被最广泛阅读的是《拟真》(1981) 和《在沉默大多数的影子里：或社会的终结》(1978)，这两部著作被符号文本出版社出版于 1983 年。现在，西方世界不断遭到鲍德里亚的诸如“拟真”、“类像”、“超真实”、“意义内爆”等术语的轰炸……^①

雷恩的叙述表明，在鲍德里亚前期简单的经历中，1968 年和 1975 年是鲍德里亚学术活动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首先意

^① Richard J. Lane, *Jean Baudrillard*, Routledge, 2000, pp. 1—2.

味着语境的力量。说到 1968 年，通常会使人想到发生在法国而举世闻名的“五月风暴”。鲍德里亚在一次访谈录中曾以非常留恋的口吻提过 1968 年的“五月风暴”，说那是一场非常让人难以忘怀的社会运动。显然，鲍德里亚在“五月风暴”期间同其他思想家一样经受了一次空前的思想震荡。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需要思考和回答的是，在评价当代西方思想历程时言必提及的“五月风暴”，到底具有怎样的当代思想史的意义？它给当代法国乃至西方学术界到底带来了什么变革？

阿里和沃特金斯把 20 世纪 60 年代说成是“质疑权威的年代”，这种质疑不仅来自法国内部，也是整个国际社会左翼力量的一次全面行动。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切·格瓦拉、菲德尔·卡斯特罗、胡志明、毛泽东成为掀动世界革命风暴的领导者。这一来自第三世界的革命召唤给西方社会以强烈的震撼。“1968 年是创造新世界的尝试，是政治、文化和个人关系的新起点。我们认为不能以‘成败’或物质财富论英雄，而应以人道主义的理想抱负：经济应该重组以服务于大众而非少数人，社会主义的命运与真正的自由和有实际意义的民主密不可分。要使世界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就必须重建一个新世界。”^① 这应该说是当时流行于整个世界的一个美妙的乌托邦理想，它把人们带入了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的年代，带入了一个革命和反抗的年代。与整个世界革命的形势相呼应，法国成为当时西方革命运动的排头兵。在西方，法国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国家。

^① 塔里克·阿里、苏珊·沃特金斯：《1968 年：反叛的年代》，范昌龙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 页。

近代历史上，法国人民以街头为战场、以鲜血为意志、以生命为代价，与权力体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789年、1870年，这样一些年代标记，这样一些革命岁月，尤其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建立，成为了革命和反抗精神高扬的一个新的高潮。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的结尾赞誉道：“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①。这是对一种伟大的历史精神的赞誉。我们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所看到的正是法国的这样一种革命历史精神的延续。

奈仁（Tom Nairn）在追问“五月风暴”发生的根由时分析说，革命很少会因为物质贫困和暴政而产生。比如，今日一些“欠发达国家”里的人们仍是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甚至遭受着暴政的奴役，但他们总是把苦难视为自然的或命中注定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使他们失去了寻求出路的任何可能。与此相反，“五月风暴”发生时的法国，资本主义文明正处于一个高度发展的时期，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从物质利益上讲，“现今西方社会里年轻一代的工人和学生照理说应该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被‘整合’、最服帖的一群……作为未来消费社会的才子佳人，学生更是最最不该抱怨的一群”。显然，“五月风暴”爆发的原因不在物质方面。奈仁认为，真正的原因来自于主体的内在动力，是主体要求自我完整性的一种强烈呼声的表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器尽管为人们提供了优越的生活，但“这一切都是生命支离、工作破碎的公民为他们的富裕丰饶所必须付出的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9页。

价。反对这样的人生世界，革命运动要奋起夺回凡是体系从他们身上采补走的所有一切。‘全人’要感受完整，行动周遍。他的主体性要求他对工作、‘休闲’、生命，要言之，所有正在进行中的事物，有从心所欲的控制力”^①。马尔库塞所说的人成为一种单向度存在，是资本主义带给人的最严重的危机。“五月风暴”的精神征候是一种对人的完整性的关注，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关注，它与任何一场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都不相同。

尽管我们说法国的“五月风暴”源起于具体的事件，^②但它的发展已经把其中的反抗行动播散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对抗精神。法国的重要思想家萨特、阿尔都塞、巴尔特、德勒兹、福柯等几乎都被卷入了“五月风暴”。这一革命运动所给予思想界的不仅是一种实践的力量，而且是理论批判的勇气和思想改造的信心。然而，法国共产党在这场革命中所起作用令左翼人士大失所望，它不仅没有成为学生和工人的指导者和坚强后盾，反而成为了国家机器的帮凶。^③在“五月风暴”消退之后，法国的思想家们重新回到书斋，他们开始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对左翼运动的反思，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他们一方面要续写“五月风暴”的理论篇章，把那种反抗和批判的精神重新在书房里点燃，福柯在

^① 这一段参阅安琪楼·夸特罗其、汤姆·奈仁《法国 1968：终结的开始》，赵刚译，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37—168 页。

^② 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法兰西的激情》，刘云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74—279 页。

^③ 参阅佩里·安德森、帕屈克·卡米勒主编《西方左派图绘》，张亮、吴勇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5—186 页。

谈及这场革命所带给他的助力时说：“对我在这一领域尽力而为的事情，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态度却是一片沉默。只是在1968年前后，虽说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国共产党的态度依然如故，所有这些问题还是显示了它们的政治意义，而其尖锐程度也是我始料不及的，这表明我以往写的书还缺乏自信，不够明确。如果没有近年来的政治开放，我恐怕没有勇气重新思考这些问题。”^① 另一方面，他们也从实际的社会活动中感受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变化，使他们的学术动机更加深入地隐蔽在他们写作风格和抽象形式中。

虽说鲍德里亚在“五月风暴”中还不可能发挥中坚作用，但这场革命所带给他的挑战欲望和反抗精神对他后来的学术活动无疑产生了关键性影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左翼革命理论的重新审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他的学术历程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完全离开了以前纯粹的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也离开了他在《物的系统》中运用的结构主义原则。他开始思考如何在萨特、阿尔都塞之外寻求一条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新途径，甚至更进一步，在批判马克思的基础上，彻底摆脱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五月风暴”的精神已经完全渗透到鲍德里亚的思想深处，成为他的一种自觉不自觉的理论选择。

2.“后学”兴起的意义

甘恩（Mike Gane）把鲍德里亚与福柯的学术生涯做了

^① 杜小真选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429—430页。

一个比较。他发现，在比鲍德里亚年长三岁的福柯事业上一帆风顺之时，鲍德里亚却历经磨难：福柯在 1970 年已经成为法兰西学院的哲学教授，而鲍德里亚在 1970 年才成为巴黎第十大学的助理教师；1968 年到 1970 年间，鲍德里亚的著作根本没有英文的译本，并且因为在 1977 年写下了“忘记福柯”一文而受到排挤。^①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后结构主义兴起于法国之际，鲍德里亚还处于学术界的边缘地位。他对“后学”理论的贡献是若干年后发生在国外的事。如同德里达一样，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在美国获得学术界关注并被传回到法国后才在法国理论界站稳脚跟的。曾与巴尔特一起工作的一段时间，使鲍德里亚回味无穷。巴尔特是鲍德里亚学术生涯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一位学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最初来自巴尔特。^② 鲍德里亚在 80 年代所写的理论短文，还可以看出巴尔特的影子。

“后学”中的基础性理论后结构主义，是法国为当代西方思想界做出的一大贡献，它的出现为后来的一系列“后学”提供了难得的理论资源。^③

^① 参阅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Introduction”, ed. Mike Gane, Routledge, 1993, pp. 1--2. 在与甘恩和阿南德的谈话中，鲍德里亚描述了早期生活的坎坷，强调断裂在他的早期生活中的意义：与父母的断裂，与大学的断裂，与政治世界的断裂。Ibid, p. 19.

^② 巴尔特于 1957 年出版的《神话学》和 1973 年出版的《S/Z》是后现代风格写作的典范，尤其是后者被认为是巴尔特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一个标志。

^③ “后学”主要包括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西方理论界流行的数种以“后”(post)命名的理论思潮，主要包括“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

尽管鲍德里亚的早期著作（如《物的系统》）明显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但以列维-斯特劳斯、皮亚杰、阿尔都塞、前期巴尔特、拉康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思潮在法国的影响不到一二十年即告结束，后结构主义迅速兴起使得结构主义者纷纷落伍或转向，后期巴尔特的转向是一个突出例子。结构主义之所以立足未稳就呈颓势，这与它本身的理论缺陷有密切关系。当时，人们把结构主义的出现作为科学思维模式和方法在人文科学领域获得胜利的一个标志，认为结构主义与传统的形而上学截然不同，是当代人文科学研究的新突破，它代表了一种未来人文科学的新方向。^①但实际上，当我们从后结构主义角度来观照结构主义之时，就会感到，它的基本精神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以理性代替神灵的思维

① 梅洛-庞蒂指出，“结构”一词尽管表现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但它的意思存在明显的相同性。“心理学家用这个词来表示知觉场的形状，由某些力线连接起来的整体，每一个现象从整体中得到其位置值。在语言学中，结构是一个具体的系统。当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能显示区分——语言符号的作用是通过其差异，通过它和其他符号之间的某种差异，而不是首先唤起一种肯定的意义——时，他强调在明确意义下面语言的统一性，在系统化的理想原则被认识到之前在语言的统一中形成的一种系统化。在社会人类学家看来，社会是由这种系统构成的：亲族关系和亲子关系（以及相应的婚姻规则）系统、语言交流系统、经济交换、艺术、神话和礼仪系统……社会本身是这些相互作用的系统的总和。当人们说这些东西是结构时，人们使结构区别于以前的社会哲学的‘结晶概念’。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主体不一定都认识到在他们中间起作用的交换原则，就像会说话的主体不需要对他的语言进行语言分析就能说话。确切地说，主体运用结构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是结构‘拥有主体’，而不是主体拥有结构。如果我们把结构比作语言，不管是言语的活用，还是言语的诗歌用法，词语似乎在谈论本身和成为存在……”（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42—143 页。）可见，结构概念的提出，对人类知识的革新具有重要意义，它从根本上破除了传统知识中的“结晶”观念，使人类思维从实体走向系统，同时也彻底颠覆了主体的传统地位。

转换非常近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奥秘是由德里达发现的。在 1966 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讨论结构主义的学术研讨会上，当美国人正准备伸开双臂迎接结构主义在美国落地之时，德里达的一篇炮轰结构主义的论文引起全场震动。德里达是这样来表述自己的发现的：“……在我所说的那种断裂之前，结构概念的整个历史就必须被思考为一系列的中心对中心的置换、作为被确定的中心的连接链条。这个中心以连续和某种规范的方式获取不同的形式或名称。形而上学的历史，如同西方的历史一样，就是这些隐喻和换喻的历史。它的母体……就是在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把存在确定为在场。它也许可以表明，与基础、原则或中心相关的所有名字，总是已经指称不断的在场——理念、元始、终极目的、能量、实在（本质、实存、实质、主体）、真实、超验性、意识、或良知、上帝、人等等。”^① 德里达的这一发现意味着，结构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不是什么值得推崇的新鲜货色，它实际上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变种。德里达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研究中发现，列维-斯特劳斯在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中，在关于语言和神话的研究中，通过 bricolage（修理工）的比喻揭示了一种非中心结构的存在。“神话没有统一性或本源。神话的焦点或本源首先总是闪烁不定、不可实现、并不存在的影子和虚像。一切都始于结构、构架、关系。这一无中心结构的话语，亦即神话，其本

^① Jacques Derrida,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in *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 eds. Richard Macksey and Eugenio Donato,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0, p. 249.

身是不会有一个绝对的主体或绝对的中心的。”^① 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需要一次真正的彻底的颠覆，从这里走向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是西方理论发展迄今为止最为激进的一场思潮。德里达在哲学和语言学领域、福柯在历史领域、后期巴尔特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德勒兹在精神分析领域……无不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西方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形而上学发起挑战，他们对隐蔽在理论思维内部的形而上学观念进行去蔽，他们以解构取代结构、以颠覆替代批判，从理论的各个领域向形而上学发起全面的深层次的进攻。德里达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研究的非结构性颠覆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结构主义的破产。

这一时期福柯的微观政治学研究也成为后现代的直接理论资源。戴维·哈维指出，福柯“对不同地点、语境和社会情景中的权力关系的微观政治学的仔细考察，使他得出结论说：在特定地域化的语境之内为了实施社会控制和支配而整理技巧和实践的各种知识（‘话语’）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监狱、避难所、医院、大学、学校、精神病诊所，全部都是那种场所的样板，在其中，分散的和零碎的权力机构独立于阶级支配的任何体系化的战略而被建立起来”^②。福柯的微观政治学与巴尔特的文化分析以及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研究一起，构造了后现代的批判图景。福柯在

① *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 p. 257.

②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4—65页。